

鼓山历史文脉简说

陈百刚 陈新宇

一、鼓山的位置、风光、形胜

鼓山，一名屏山，原在县城西郊，离县治一公里许。县城扩大后，鼓山已在城中。现今，建设新昌旅游新城呼声甚高，而鼓山因其风光秀丽、地势独特、文脉绵长成为得天独厚的的一方宝地。如何保护、利用、开发、建设它，系全县人民共同关注的事。

从《一统志》、《会稽志》到历代旧县志，对鼓山都有记载：“又名屏山，脉自旗峰，降于平行，岿然特起。圆顶若鼓若屏，有泉池可田。山横截水浒，为邑之门户。”很简要地把鼓山特点说清楚了。地质地貌学分析，鼓山岿然独立于新昌江畔的河谷平原上，系一座小型的玄武岩台地，海拔110米，山顶平坦，面积仅有百余亩之大，其中有天田10亩，今为烈士纪念碑及气象站。四面山体亦坡缓成梯地，地边多古坟，断砖遍地，多为晋时物。其山之脉来龙于西南方向不远处的旗山(即磕山)、石城。从山脉的宏观态势考察，它的位置处在天台、四明两大文化名山的正中间。民国《新昌县志》中有两段很精彩的记述：“……溯天姥、沃洲而下，断而复续，伏而复起，崒峭拔，蟠踞数十里。其为状也，如龙之翥，如凤之舞，腾激踯躅，关山轴地而雄峙岳之西者，石鼓山也。”“南望旗山，如见大宾矣；北负金庭，委羽瑞莲龙骧之迹犹存；三溪绕其西，四明倒影，昂知章之狂放；天姥在东，凌云云表……”

《化成新昌县志》卷八从另一角度描写其形胜：“旗山如旗，鼓山如鼓，当县廓之风门水口，南北对峙。激以溪流，而有填然之声；拥以云气，而有飞空之势。远而望之，何异将军之屯营，敌人之赴战也。”旗鼓相当，宝势镇雄，这里又成为一个特具阳刚之气的宏伟景观。《化成新昌县志》把它列为县城八大景观之首“旗鼓争雄”。

历代诗人吟唱鼓山风光的诗文甚多，尤以邑人尚书何鉴的诗为佳，描绘了一幅全景图：“步入西郊日已哺，眼中突兀一山孤。包栏风气如屏障，壮观封疆入画图。丘壑岚光人自爱，云林晴色鸟争呼。望迷千黍连万亩，路转荆棘入坦途。远脉孕钟天姥秀，长川壤接剡溪纡……”

鼓山可登、可憩、可观、可耕、可读、可隐，确是一座理想的天然乐园。

风光形胜只是鼓山的外在优势，事实上，鼓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。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脉和丰富的文化积淀。这才是它主要的价值所在。本文着重对其历史文脉作系统简介。

二、王羲之与鼓山

鼓山的历史文脉可从王羲之说起。东晋(317—420)是新昌地域社会形成和地域文化开创时期。书圣王羲之(303—361)是东晋王朝文化精英群落的领袖人物。永和十年(355)，王羲之誓墓(在父母坟前发誓立愿)辞官，后隐居剡东，鼓山就是他主要活动据点之一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载：“……栖心绝俗，修黄老之术。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，弋钓为娱。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，采药不远千里……穷诸名山，泛游沧海，卒当以乐死。”王氏家族是天师道虔诚信徒，晚年的王羲之对道教迷恋更深。鼓山就是王羲之隐逸修道的地方。山多墓砖，为两晋遗物，可见附近早有民居。

查阅清朝乾隆己酉(1789)《新刻琅琊王氏宗谱》和民国丙寅(1926)《梅山王氏宗谱》，均收录有唐代平阳公路应撰的《唐越州剡县鼓山王右军祠堂记》，记载王羲之“早镇金庭，晚遁鼓山……创金庭道院于功岭(一说梅岭，疑即王罕岭)。晚年托迹炼丹鼓山，创紫芝庵，置山市田。其孙相国尚之居剡，立祠于山

麓，以奉祀事，轮奂翬飞，成一方千古之壮观。”上二种王氏宗谱内还收录了王羲之本人《鼓山题辞》文：“……致政金庭，南明别墅。光鼓西涯，剡邑东鄙。绝巘周垂，崇冈顿起。鼓宏对旗，巖夷若砥。其地可锄，有药堪饵。奚翅沃洲，岂让天姥。结庵紫芝，爰居乐土……仲尼成仁，朝闻夕死；孟轲传道，无有乎尔！世远人非，知难遁此。右军镌石，鼓山同峙。”根据《题辞》，王羲之晚年曾在鼓山炼丹、采药、结庵，还置有田宅，建造过别墅，活动一定很频繁，居住亦应相当长久，非徒足迹所至而已。正因为如此，王羲之的孙子王尚之在鼓山之麓为其祖建造了“王右军祠堂”，而且建造得相当壮丽辉煌。这座号称“一方千古壮观”的右军祠堂至少到唐中期还完好保存着。撰写《祠堂记》的唐人路应，在唐贞元到元和间(785—820)做过州刺史、散骑常侍等官。撰《祠堂记》时估计离尚之建祠已有400多年了。《祠堂记》和《题词》的可靠性是可以探讨的，但没有确凿证据前，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它。

王羲之遁迹鼓山留下了道教文化，从《题辞》对孔孟的追怀中也可窥见儒家文化的影响。应该说道家与儒家文化都存在早期鼓山的历史文脉中。而鼓山与王羲之连在一起，使这种文脉在起点上就具有很高的品位和广泛的影响。

儒道两种文化传统在鼓山并行不悖地存在着、发展着，到宋代，儒学文化发扬光大起来，出现了鼓山书院的辉煌时期。

三、石氏家族与鼓山书院

鼓山书院开创于北宋天禧间(1017—1021)，创办人是当时新昌著名教育家石待旦(985—1042)。新旧地方志对早期鼓山书院的记载很简略，只提到“尝延程夫子明道(颢)(1032—1085)讲学于此”，“旧为王石亚之(1018—1057)读书处，名石鼓书堂”，“后石子重讲学于此，著《中庸集解》，朱熹尝采其说”。具体情况，虽语焉不详，扑朔迷离，而鼓山书院的创办与发展，离不开石氏家族是无疑的。有必要先说几句石氏家族。原石大宗祠内三副名人对联，把石氏家族在两宋时期文化教育上的赫奕辉煌，表述得淋漓尽致：(一)“祖(待旦)延明道，孙(子重)友晦庵，奕世文光凌北斗；兄(公弼)劾蔡京，弟(公揆)弹秦桧，塞天浩气镇中州”(王阳明)。(二)“同朝十学士，六部五尚书，跻跻冠裳右族；一门三状元，四代九御史，巍巍甲第第一名家”(状元倪元璐)。(三)“义塾宏开，造就七十奇英，陶铸四宰相，德望浙中第一；儒林丕振，继起五百六进士，中兴三状元，科甲天下无双”(状元洪珠)。所以陆游说“浙中右族，石氏为大”。对联中虽没有提到鼓山书院，但从《石亚之墓志铭》中获知，待旦创办石溪义塾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区，下区名“集贤讲道”，地点就在鼓山书院。石氏家族的人才辈出，名闻天下，岂能与鼓山书院无关？同时，书院与两宋二位大儒程明道、朱熹又有特殊关系。程朱理学，继承发展孔孟道统，而鼓山书院在传播程朱理学，把当时最先进的学术文化传入新昌，并推向浙南起了中介作用，其业迹又岂可轻视！

石待旦(985—1042)，隐新昌石溪，与诸弟共创义塾三区，分“白云青嶂”、“石城半隐”、“集贤讲道”三个层次。礼明道程夫子为师，躬自设教。四方受学者，悉饮食缝紵之。相传北宋文(彦博)、杜(衍)、韩(绛)、吕(公著)四相曾来受业，留有“四相潭”地名。范仲淹守越时，聘为稽山书院院长，极尊礼之；苏东坡守杭，亦曾礼为乡先生。宋仁宗闻其名，曾赐“待之景公间宗孝正奕祖”十字为子孙名号。卒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刑部尚书。鼓山书院之名何时正式确定已难考定。《宗谱》只记石待旦有五子，

次子石亚之曾隐于鼓山读书，名曰“石鼓书堂”，估计这个书堂就是书院的前身。

石亚之(1018—1057)，字潜夫，幼称石好儿。宋景祐元年(1034)进士，年仅17岁，丰神秀俊。宋仁宗十分赏识这位才貌双全的士子，意欲招为驸马。石亚之却婉言相辞，说“亲老愿归养，且家已议鲍氏，王姬非敢偶也”。宋仁宗居然也没有勉强，封赐他为“太常博士”。不久，他就弃官归隐，读书于鼓山，并捐田立观宇。估计书院之初具规模，即在此时。宋景祐三年(1036)，朝散大夫章骧撰《石鼓主人记》：“鼓山之下有井焉，井曰‘石井’，千仞碧泉而瑞莲飘香；有池焉，半亩方塘而飞鱼跳跃。左右前后，佳山秀水之盘旋，中建一堂，以为栖息藏修之所者，石公也。石公耕石鼓之田以为食，樵石鼓之木以为炊，蚕石鼓之桑柘以为衣，群石鼓之麋鹿以为友……吾知潜夫不能终居此中而为主人也。讲论经史，寻探义理，以为一身进修之基，是假石鼓之招隐而寄声。盖其高风亮节，睥睨一世，有可慕不可追者乎？”从以上记述看，鼓山更像是石氏的一座庄园，不过石亚之在此“讲论经史，寻探义理”，已为隐居读书明志的处士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和风标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院也就顺理成章了。《石鼓主人记》中还讲到一个神仙故事：亚之尝遇异人，授以丹药，不敢服，投池中，即有“莲开鱼跃”之异。参军楼钥曾有诗和联曰：“莲瑞古井香，龙骧砚池碧”，“书堂蔓葛，百年闻太博之弦歌；丹灶永成，九转服仙人之药饵”。可见，石鼓书堂里还笼罩着道教丹药的气氛。

关于聘请程明道讲学之事，估计可能与石待旦诸弟待聘、待用等继兄遗志续办义塾和董理书院有关(待旦卒，明道才十岁)。石溪义塾中，中区为“石城半隐”，下区为“集贤讲道”。“鼓山书院乃石公待旦集贤开讲之所”(见亚之公墓铭)。是否确曾请程明道讲学，尚待考证。但他们之间学术上有交流、人事上有交往则是情理中事。

石亚之开创的读书明志、诗礼传家之风一直在家族内承传下来。亚之次子四十二世石景淹、孙四十三世石端孺都有学问。石端孺，原名公孺，字长孺，长于《春秋三传》，曾著《春秋类例》十三卷，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中。宋高宗器重公孺，召对称旨，礼为国土，命官固辞，高宗曰：“卿当为朕勉受一官”，授迪功郎，除南岳监。宣和三年庚子(1120)兵事，移家临海。石端孺次子叫石邦维(1090—1135)，虽未出任，却具公忠体国之心，语及“靖康之耻”，辄愤慨不胜。邦维的儿子即石懿(1128—1182)，字子重，号克斋，为地方一代儒宗。他在鼓山书院讲学传道，发挥孔孟奥义，传播程朱理学，使鼓山书院声誉鹊起。故宋以后，院内历代都为他立像崇祀。《光绪新昌县志》则直言：“石子重建书院。”

石懿(1128—1182)，绍兴十八年(1148)进士，先后任武进县令、尤溪县令、知南康军，均有政绩。他与朱熹三仕同官，交往密切。天资高迈，探究性理之学，领悟经传宗旨，尽得其精奥。朱熹尝谓其论“仁”之体要甚当，发为著述，简明醇粹。一生著作甚丰，有文集数十卷，对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周易》等儒家经典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。尤其是《中庸集解》(集十先生之讲解)一书广为刊刻发行，全国著名大书院如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均列为主要教材。朱熹为该书作序，并采纳其研究成果入《四书集注》中。宋以后，朱熹成为孔孟道统首席传人、宋明理学大宗师，其《四书集注》也成为历代科举取士的主要依据。石懿在学术上的地位就和朱熹联结在一起了。明嘉靖十三年(1534)，状元出身曾任会稽知府的洪珠作《鼓山书院记》对石懿有评价：“呜呼！孔门一派，自孟

子后至明道而始明，紫阳(朱熹)一派传自伊洛(二程)，新昌一派(石懿)分自紫阳，不可诬也。”又因石懿徙居临海，这一道统又传人台州。《宋元学案》载：“台学源流因之。”《绍兴府志·人物》把石懿列为“理学第一人”。府志和县志中还多次提到：自明道、石懿在鼓山讲学传道后，纠正了迷漫在越中的佛道文化和名士文化所造成的弊端。所谓“仙佛幻迹，风流题咏，王谢一派为烈”，而“名贤盛德，世胄躅之”反而不彰，这对以“修齐治平”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说是“耻莫大焉”之事。石懿以求“仁”、“道”、“中庸”为要并终其身，思以“行之乡国，天下来世”，影响所及，学风丕变。清康熙雍正间，省、府、县三级地方官及县内100多名贡生曾多次联名上奏，请求将石懿配享全国各地文庙，列位于大成殿两庑，虽未果，亦可见地位崇高，影响深远。鼓山书院内一直立有石懿像，供人瞻拜。

四、明清至民国的鼓山书院

宋末及元代，鼓山书院处于衰败状态，记载缺如。从元末明初邑人零星诗文中获知，鼓山已不闻读书之声，而成为道教活动之地了。明初吕升有诗感叹：“缅怀古君子，再择睹遗迹。回廊严神像，壤壁阴藓蚀。如何古名地，属此羽衣客。顾我非异端，感此长叹息。”何鉴也发出同样感叹：“书院空传遗址址，遗流今已作仙都。从来胜地多方外，自昔登临属士夫……”。

直到明嘉靖间，由知府洪珠倡导，书院得以重建，并踵事增华，扩大规模。嘉靖十三年(1534)书院落成，洪珠作《鼓山书院记》中说：“乃寻鼓山旧址，得地直可十八丈，横如其数(占地约3600平方)，构六楹，中设石懿神位。前四楹为台门，南临大路，建碑棹(牌坊)以树风声。山田地共28亩，祀先先生裔孙(石家子孙)克刚岁供祀事。堂中屹势尊，宅安境静，泉石幽响，前人讲学声韵，若可听闻。”

明末清初，书院又有一次劫难。嘉庆间(1796—1820)，书院再度修建。其时，城中有南明书院，因地湫隘，而鼓山“挹名山之秀，嗣道学之徽”，故将南明书院移并鼓山。修建费用甚巨，由当时富绅陈氏恭人(中宪大夫吕周绪之妻、大夫吕保之母)令其孙乔柯、乔槐投状独建。嘉庆乙亥(1815)始建，次年落成，戊寅(1818)知县涂日曜作碑记。吕氏共捐建讲堂、肄业房50余间，讲堂复祀石懿像，共费以万计。又捐田20亩，作为每岁修理之用。这样经过一百多年，书院又趋颓坏。近年失修，山岚之气，蒸为白蚁，蚁善蚀木，一柱之朽，全厦为倾。光绪间，邑令侯琇森谋诸吕氏族人，再次筹款重修。这次由陈氏恭人曾孙、元孙辈茹藻、茹藩、茹芬、邦钧等共捐制钱千余缗，于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建成。院舍再度轮奂美备。又捐田8亩，合计36亩。有清一代，对重建鼓山书院贡献最大的是吕氏家族。这次重建后，一直维持到民国，其遗存至今还在。

书院肇始于唐，兴旺于两宋，它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机构。一方面在私塾、义学、家塾等初级启蒙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深造士子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承传和发展学术文化的研究机构。一般书院由政府统一规定招收名额，生徒分正课、附课、随课三个等级。正课生徒每月膏火费各三三两(银)，附课各一两，随课无膏火费。每月进行官课，院课两种校课，课考评分按名次排列，可升降原有等级。鼓山书院建院数百年间，大致上也按这个制度办。院请著名学者、博通之士执掌教席。地方官也常亲临讲堂：“诸生肄业其间，掇巍科，膺高爵，显名于时者，先后踵相望。”如清乾嘉期间，会稽茹芬(后中状元)曾来掌院，与新昌城中横铺石板树兰堂主人陈克淳交好，陈克淳之

子陈榭箕入书院为茹芬高徒，后中举，官严州训导，是著名教育家，受道光传旨表彰，身后位列乡贤祠。陈榭箕之子陈荣燮多才艺，善书画，文章经济倾动京师，中进士，点翰林，官至户部主事。横铺石板陈家一门俊才大都从鼓山书院培育成才。其余如名进士俞汝农、名举人吕嶂、名绅陈聚奎、天台著名学者齐召南也都和鼓山书院有不解之缘。

迨至民国时期，旧式书院寿终正寝。抗日战争期间蚕桑家陈石民曾借鼓山书院旧址办过农桑学校；抗战后，办过新昌县简易师范学校。晚清名进士梁葆仁之孙梁以忠掌校，治教严谨，艰苦创业，培养300多名学生，成为以后新昌县小学教育骨干队伍，对社会贡献不可低估。总之，书院之历史文脉一直得到承传。

五、鼓山的道观

鼓山的历史文脉中兼具儒、道两种文化。王羲之炼丹、采药、结庵之记载，石亚之遇仙人的传奇明显属道教文化。但根据确切的文献记载，鼓山建立道观则在南宋初。《民国新昌县志·寺观》卷七载：“鼓山真圣观，在三都石鼓山，东岳行官前。宋绍兴十四年(1144)，知县林安宅建。宝庆中(1225—1227)，知县赵时佺重建，中有石太博遗像。”石太博即太常博士石亚之。

真圣观中塑玄真帝师像。据《道经》记载：“(玄真)帝师于隋开皇元年(581)三月三日，诞生于净乐国王之宫中，生而神灵，长而圣武，弃王嗣弗居，发大愿，誓入武当山中，悟道修真四十余年。道成升天，谒上帝。帝命躡真武之位，以神教伏天下群魔。以是元化大行，天下咸称救主帝师……由开皇以来，列代罔不钦崇，祠祀遍天下。”

鼓山近县治，阡陌之冲，往来丛杂，兴废靡常。较之书院，道观更易受侵略，其间沧桑之变已难详述。直到明嘉靖间，道观由尚书邑人吕光洵重建，改名元真庵。在《重建古山元真庵碑铭》中，吕光洵说明了建庵原由：吕父芝山府君吕世良，一生慕道，作诸善果，事帝师尤甚。光洵乃体察父志而重建道观，此其一；又光洵仕宦四十多年，曾任御史按察关西，又任工部督建芦沟桥，又出赴云南平叛，一生历尽艰险，危而不殆，他认为帝师阴灵庇佑所致。再，光洵长子应鼎已科举致仕。帝师大造之恩，三世于吕氏，故吕氏备加崇敬，不吝巨资重建。嘉靖丁卯(1567)，光洵扶真归里，万历四年丙子夏(1576)，于鼓山原真圣观之南，重飭栋宇数楹，庄严法相。以其乃旧绩也，乃更名古山，颜其庵。

明季沧桑，苦遭兵燹，庭宇颓废，元真庵与书院时鞠为茂草。直至清乾隆间，道观又得以修复。乾隆十七年(1752)，天台齐召南(礼部侍郎)作《重修古山观碑记》中云：“乾隆辛未(1751)，临海紫阳观素抱真之法孙王洞虚重兴之，檀樾吕氏暨石氏鼎助之。又期年而神像辉煌，金容闪烁，石氏诸君亦群起重建书院之议。”

乾隆以后，鼓山书院与元真道观同时并立于鼓山中，琅琅书声与袅袅香烟使鼓山笼罩在浓浓的儒道文化气氛中。齐召南碑记中说得明白：“书院石坊峙道左，院与观犬牙相错，唇齿相依，观兴则书院亦兴。”又有对联为证：“庙貌重新，真武英灵昭北极；斯文未坠，石家书院在东邻。”这情形，一直维持到晚清光绪年间，颓败不堪的鼓山书院再度重修，道观则已消声匿迹矣！

六、结 语

本文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整理成稿，供规划和建设新的鼓山风景名胜胜区作参考。

(限于篇幅，结语部分略作删节)